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近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雷云飞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历经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 诸多思想家积极探索中国的前途命运, 并探讨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的实践状况相结合, 阐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 并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近代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 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为中国社会革命由自发走向自觉创造条件,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社会实践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唯物主义历史观; 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3.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3-0001-08

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演进历程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内在关系, 然而, 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前,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基本是在黑暗中自发前行的。这是两条迥异的线索。近代中国逐步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不仅发生在世界历史大变局中, 更有着近代中国社会自身独特的内源性缘由。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

近代以来的中国, 亡国灭种的忧患使一切预想成为空想, 也使我们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放弃了更主动、更审慎的学理分辨, 采用粗暴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思想传统也就必然地会采用粗暴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当代史^[1]。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颠覆性变革,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冠以“洋”字的商品充满方兴未艾的市场; “大刀长矛”的过时和一去不返, 随之而来的是洋务运动置办的洋枪大炮;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惊鸿一瞥, 换来的是放眼看世界的历史潮流; 器物的更新换代, 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

其一, 中国的近代史同欧洲的国际贸易密切相关。魏源在1841年的《英吉利小记》中写道: “国中产豆、麦, 少稻, 不给于食, 皆仰给邻国。以濒海, 专事贸易, 故船炮讲求至精, 与荷兰、佛郎机相等。于是凡商舶所至之国, 视其守御不严者, 辄以兵压其境, 破其城, 或降服为属藩, 或夺踞为分国。”^[2]英国的国际贸易就是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两极相联”辩证法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历史时期顺延着英国国际贸易的路线看向东方社会乃至近代中国,

收稿日期: 2023-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XZX002)

作者简介: 雷云飞(1981—), 男, 陕西省岐山县人, 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并且在其关注中国的思想理论著述中,英国亦是近代中国的最大强敌。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贸易居于顺差地位,但在整体的贸易格局中逐步陷于被动而难以自拔的状态,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诸多军事冲突的频频失败,这从林则徐向道光皇帝的奏章——《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1840年9月24日)——中便可窥见:“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3]这说明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近代中国重视洋务、发展近代工业的开端。如果说民族资本主义只是近代中国“洋务”的副产品,那么洋务运动则是近代中国逐步走向光明的历史起点。

其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掘墓人”,也是民主革命的经济条件。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洋务运动成为晚清的自救方式,从左宗棠上书同治皇帝的奏章——《船局创始之初未可期以速效片》(1866年11月14日)——中可以看到当时发展洋务的现实状况:“自通商以来,各海口大小马头,番舶鳞比,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人皆知之。”^[4]这就阐明了实行洋务、发展近代工业以提升军事竞争的能力,是时局所迫,同时也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提供了契机。“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行……此外开矿务,垦旷地,筑铁路,皆与民共

其利,务俾民情得以自达,而不至于上下隔阂,则民间忠义之气自能奋发于无形。”^[5]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思想,在晚清封建专制统治下难能可贵。由于历史局势的紧迫,这些智慧火花在短暂的时间内迸发并延伸至对全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探讨之中。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探讨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难御外侮的根源:在“积弱之源于理想者”方面,国人“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在“积弱之源于风俗者”方面,国人的状况则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在“积弱之源于政术者”方面,“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话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6]80-93}。这些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原因的剖析发人深省,为后来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重新认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论述和探索。“国家之有政治,其目的安在?曰:一以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以谋组成国家之分子即人民之发达。斯二义尽之矣。虽然,斯二义者,形式虽异而精神则同。盖人民若瘁,则国家决无自而荣,故为人民谋利益之政治,同时即谓之为国家谋利益焉可也。”^{[6]289}至此,近代中国历史上内源地地探寻民主革命思想基本形成雏形。

其三,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石。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探寻谋求民族振兴的民主之路,不仅有着来自外部的客观条件,也有着中国人本身寻求救亡图存的主观努力;不仅有着来自先发国家的先进社会思潮和政治潮流的影

响,也有着中国人对民族前途的思想理论探讨。历史证明,近代中国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思潮的探索中则发现,社会主义不仅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予中国的指引,还有着近代中国内源性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探寻,更有着独具近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其一,平等观念的形成和理论的探讨,为近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奠定思想根基。谭嗣同在其《仁学》一文中,将“仁”这一概念从传统文化中继承过来,并赋予其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平等内容:“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其为物不贰,故生物不测。不贰则无对待,不测则参伍错综其对待。代数如权衡然,参伍错综之不已,必平等,则无无……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7]5-6}谭嗣借助西方代数推理的方法,证明了“仁”这一概念具有“平等”思潮的应有之义,这是立足近代中国状况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谭嗣同的平等思想虽然脱胎于传统仁学和宗教的平等观,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政治学意义和哲学意蕴上的平等。谭嗣同牺牲后,梁启超为其《仁学》一文所撰的序中明确指出:“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7]65}这样的平等观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和内涵,“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基于人们的意愿,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更平等”^[8]。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的平等观是近代中国开始探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起点。其二,社会主义思辩在近代中国的内源性产生,在社会思

想意识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平等观的启发下,近代中国开始自觉地探讨充满希望和平等的未来美好社会。1906年10月,《新民丛报》第89期刊登了吴仲遥《社会主义论》一文,梁启超为之作序^[9],梁启超在该序中阐明其基本立场和态度。梁启超虽然主张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支持建立民族资产阶级政权,认为社会主义在“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但也认可“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矣”^{[6]279-280}。这说明在近代中国,很多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值得中国去探索、学习和实践。

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在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在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仁人志士的眼光从关注器物上升到思想观念的快速转变,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疑窦丛生,但是从谭嗣同探讨平等开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已经逐步做好了迎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辩证结合为中国社会革命由自发走向自觉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两极相联’的思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10]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认知、分析与论述都是在运用和验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近代中国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东方社会的重要窗口和“试验田”,更是马克思恩格斯施展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舞台”。

一方面,鸦片战争不仅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将关注东方社会的视野聚焦于近代中国,更使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洞悉了近代中国父权关系濒临解体的历史边缘。鸦片战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变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地向外输出,“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私贩鸦片“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各省官吏“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这种官吏私贩鸦片而大发国难财的贪污行为,“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关系”。虽然这是晚清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但是破坏这一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近代中国南方各省首先爆发起义^{[11]9}。马克思不是简单地由表及里地对这些论述进行分析和梳理,而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依据和方法探寻近代中国由封建专制走向革命的内在逻辑,阐明随着鸦片战争的冲击,在对外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家长制权威和父权关系这一社会精神纽带逐步解体,鸦片战争使得“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中国人在被鸦片麻醉之后,鸦片“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11]7},当时中国南方的起义就是其重要表现。而这正说明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在被时代惊醒之后所释放出来的强大革命力量。尤其是在近代中国与欧洲进行的对外贸易中,鸦片贸易及其所引发的中外冲突,是绷断中国封建社会“闭关锁国”之沉重锁链的关键一环,是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从而全面接触世界潮流的杠杆。因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当与世界完全隔绝的中国被英国采用暴力而完全打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封建社会的必然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1]8},即“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这场中国革命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因为鸦片贸易所发挥的“催化剂”作用导致中国封建经济濒临破产的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

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11]7}。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近代中西贸易是欧洲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这不仅检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探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西方列强在用军舰大炮将资本市场的“新秩序”传送到中国之后,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旧秩序”的解体,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来自列强的棉纺织品和鸦片充斥着中国市场,而中国市场鸦片的过度输入和消费,导致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其他商品陷于滞销,从而引发欧洲的社会动荡和阶级对立并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1848年欧洲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两极相联”中爆发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1]11}。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引发这场动摇和冲击其资本主义根基的革命的“导火索”,正是远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同样,对于近代中国,引发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变革的“导火索”亦正是由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然而,其最大的不同点是,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在经济危机中愈演愈烈;而在中国则是以农民运动为起点的、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的民主革命。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罂粟种植和炼制鸦片的盛行加剧了封建统治的瓦解,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鸦片贸易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发挥着独特的辩证作用,尤其是随着近代中国国内种植罂粟并炼制鸦片的蔓延,更是凸显了这种特殊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家都知道,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11]12},当时中国的皇帝正是咸丰帝,这一令人震惊的观点在后来的一些报纸杂志的宣传中得到印证。享有中国现代报纸之开端盛誉的《申报》——《申江新报》——于1872年7月9日,即大清同治十一

年(壬申年)六月初四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该文指出:“鸦片烟土之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灭二千数百万两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无论中土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者所耗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富国化民之道也。”虽然官方仍然禁止当时国内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但在民间却普遍,而这与马克思所指出的咸丰帝有意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炼制鸦片的观点相比较,在时间上尽管相差只有19年,但是这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的变化却是相当惊人,因为中国各省都在种植罂粟;当时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已经有意于通过鸦片来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对鸦片征收高昂的税收,不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以减轻清政府经济压力,同时也是一个根据国内贫富分化的现状而实现禁止鸦片目的的有效途径。虽然这是一个无异于抱薪救火和扬汤止沸的愚蠢之计,但是从其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当时社会和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无以复加。近代中国大量种植鸦片的行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欧洲来说,对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近代中国罂粟种植和炼制鸦片的盛行加剧了封建统治的瓦解。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着比较尖锐的“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的民族矛盾,但是在鸦片贸易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11]11}。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更加爆烈”,确实印证了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变迁,1853年的中国革命实际上主要是指爆发于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但是当时的

19世纪70年代也正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沉重的过程,也就是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过程。这种阶级对抗从平缓走向激烈的过程,也就是封建统治加速瓦解的过程,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实践状况的交相辉映。其二,近代中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的盛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一文虽然只是一则倡导解除鸦片禁令的文章,而且清政府也并未解除鸦片禁令,但是鸦片荼毒国民的客观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清政府对鸦片蔓延的失控和政治能力的丧失已经纤毫毕现,与鸦片战争之前相比较,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机遇。马克思指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1]70-71}。其三,近代中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的盛行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两极相联”的思想观点,近代中国社会在国际贸易的条件下与欧洲产生直接或者间接联系是历史的必然;同时,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近代中国与欧洲会爆发社会革命,尤其是中国会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瓦解的基础上走上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甚至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可能。马克思对此指出,“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1]12}。这就阐明了中国种植鸦片和国内矛盾冲突升级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

“两极相联”的近代国际辩证格局,不是一个对辩证法的简单套用而得出的结论,而是马克思科学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认知近代世界历史、洞悉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条件,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世界历史、民族历史相结合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统一体,从而对“两极相联”实现了批判继

承,使黑格尔的“两极相连”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三、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社会实践条件

马克思将世界历史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结合,用来重新认识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认知和反思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并从中汲取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实践经验,为其走向成熟创造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近代中国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以下重要的社会实践条件。

其一,中西商品贸易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经济条件。中西商品贸易,尤其是鸦片贸易,是近代历史上牵动中西经济互动、文化交流乃至社会变迁的“红线”,“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贸易之路,亦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欺侮之路。从行动路线方面来看,无论是从中国到欧洲,还是从欧洲到中国,基本一致,只是标识动向的地图箭头方向恰恰相反而已;只不过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茶叶和丝绸,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而列强向中国输入的主要是纺织品和鸦片,是侵略和欺侮。而这一切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亦无比清晰,马克思通过具体的贸易数量与折合为白银的价值,具体研究和分类汇总,在中西贸易的数量变化对比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西贸易对欧洲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动因^{[11]18-19},进而得出“不能期待白银很快就会停止向亚洲流动”的观点,重要的是“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的”^{[11]20}。而这个时候的欧洲正处于1848年革命风暴的影响之下,中国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就

更为显现。马克思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而这一论断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抽象推理,而是从具体的经济贸易得出的科学观点,这推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其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相结合,并不是通过当时的报纸杂志获得零散的信息,也不是随机偶然地论述近代中国,而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关注近代中国并做出的经典论述。一方面,“停滞的社会生活”是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停滞”表明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人思想意识相对封闭,尤其是在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强制性冲击以后,中国人在面临社会巨变时所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11]122}。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外来强制力量的施压,这个以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停滞”是难以被突破以实现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11]122}。这主要因为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社会“停滞”状态的终结并走向“运动”,直接原因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11]122}。无论如何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从“停滞”转向“运动”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太平军身穿对中国人而言有神奇作用的“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使欧洲人觉得好笑”,马克

思却给予太平天国运动以高度评价,认为这场运动是一场革命,是一场独具近代中国特色的革命。另一方面,鸦片的“警醒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转折点。在近代中国由“停滞”走向“运动”的过程中,鸦片贸易起到重要的诱发作用,鸦片贸易是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并逐步走向社会革命的转折点,其中“欧洲人的干涉”实际上是在世界历史潮流中进行资本扩张和商品贸易的外在现象,东印度公司(英国)“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11]70}。鸦片贸易虽然是资本扩张的手段和商品贸易中欧洲列强扭转贸易逆差的选择,但是其影响深远,无论是政权根基的动摇,还是白银外流,抑或是经济贸易平衡的打破,都是以鸦片贸易为载体的。马克思对此做出论断,鸦片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文明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11]69}。

其三,商品生产方式的变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助推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论述,具体是针对近代俄国国内生产方式的形成历程及其使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展开的。然而,马克思虽没有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缺乏内在关联,后继者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相结合,从而得出中国不仅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其还推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结论。首先,中国有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厚历史和现实底蕴。马克思对俄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寄予厚望,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12]435}。这里的“农业公

社”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组织条件。对于马克思而言,原始公社应该具备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包含有公有制因素,另一方面又包含有私有制因素^[13]。虽然“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12]434},但是必须以其自身的历史而“保存到今天”,封建社会的中国也具备马克思所指出的“原始公社”的特点,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有迹可循。有学者指出,中国中古封建社会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比较缺乏的,凡是劳役地租长期存在的地方,社会形态就难于改变,从而形成所谓长期的静止状态^[14]。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类型的研究总体看来有三大类:(1)封建土地国有制,包括皇族土地所有制、大土地占有制等;(2)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包括贵族、官僚、豪富等大土地所有制;(3)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第一类是国有制,后两类同属私有制^[15]。这些观点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原始公社”的论述相契合。其次,近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中国走向成熟提供了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具体论述近代中国由“停滞”转向“运动”后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始终未变”中间接地表达了与论述俄国一样的结论,用唯物辩证法更加深刻地将近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近代中国生产方式变革的缘由、过程和结果,以鸦片战争为思想基线分析近代国际贸易的转变、白银的流向、白银和黄金交替充当国际支付的手段,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变化等方面,追寻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稳定性“停滞”的现实根源及其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作用。再次,对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形成的洞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中国走向成熟的历史性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商品经济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潮流下通

过鸦片贸易而在落后的中国成为现实的必然结果。“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11]130}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论断除阐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何以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外,更论证了“无数劳动者饭碗”的丢失和“生存形式”的改变,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破产,在“生存形式”改变的逼迫下沦为给资本带来增值的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自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英国人就在亚洲取得更多的进展,而资产阶级也就在那里兴旺起来了。随着机器的推广,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不断被消灭”^{[11]131}。同时,社会阶级状况亦发生变化,“小手工业者破产了,被迫去当普通的工人”^{[11]132}。由此,近代中国基本具备走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级条件和生产力条件。

综上所述,马克思继承黑格尔“两极相联”的辩证思想,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相结合,阐明了近代中国从停滞走向运动的变革过程,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相结合,表明中国也具有像俄国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李建群. 阐释的通变与哲学的融合[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7(4): 7-9.
- [2] 夏剑钦.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魏源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87.
- [3] 杨国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林则徐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85-287.

- [4] 杨东梁.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左宗棠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3.
- [5] 海青.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20-221.
- [6] 汤志钧.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启超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7] 汤仁泽.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谭嗣同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8] 段忠桥. 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J]. 学术月刊, 2011, 43(5): 31-36.
- [9] 欧阳跃峰. 20世纪初立宪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4(2): 27-30.
- [10] 俞良早. 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联”的思想[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1): 114-124, 16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 [13] 方兴起. 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论俄国农业公社[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7): 32-40.
- [14] 侯外庐.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J]. 历史研究, 1954(1): 17-32.
- [15] 启循.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述[J]. 历史教学, 1979(6): 36-37.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雷云飞.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近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3): 1-8.